

宁波帮史略

近代以来，宁波帮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和在各个领域的杰出成就，抒写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百年辉煌，为中国经济社会的近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今，在外创业的宁波帮仍活跃在海内外并名闻遐迩。

孙善根◎编著

本书系宁波大学浙东文化与海外华人研究院项目

“海外宁波帮史料整理与研究(ZYJYD1201)”成果

宁波帮史略

孙善根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波帮史略 / 孙善根编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526-2248-5

I. ①宁… II. ①孙… III. ①商业史—研究—宁波市
IV. 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1261 号

宁波帮史略

作 者 孙善根
责任编辑 钱升升
责任校对 虞洽璐 王 丹
责任审读 尤佳敏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印 刷 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60千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2248-5
定 价 40.00元

目 录

第一章 形成篇

- 一、宁波帮形成的地域因素 003
- 二、明州海商 006
- 三、宁波商帮的形成 009

第二章 崛起篇

- 一、“无宁不成市” 015
- 二、“行业翘楚” 031
- 附录(一) 近代旅沪宁波商人在各大银行任职情况 079
- 附录(二) 钱业公会历届正副会长、董事、委员、理监事名录 081
- 附录(三) 秦润卿与近代上海钱庄业 085

第三章 海外及港澳台篇

- 一、海外及港澳台宁波帮的形成与发展 101
- 二、海外及港澳台宁波人社团的历史与现状 113
- 附录：三代宁波人闯荡港岛纪实 123

第四章 家族篇

- 一、北仑小港李家 133
- 二、镇海横河堰包氏家族 140
- 三、大碇头顾氏：从宁波走出来的航海世家 147

第五章 人物篇

- 一、沪上最早的浙江籍买办杨坊 153
- 二、日本北海道侨领张尊三 160
- 三、颜料大王周宗良 165
- 四、模范商人项松茂 171
- 五、现代银行家胡孟嘉 179
- 六、国货业巨子李康年 185
- 七、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 192
- 八、影业巨子邵逸夫 205
- 九、新加坡侨领胡嘉烈 211
- 十、世界船王包玉刚 217

第六章 社会政治篇

- 一、宁波帮与辛亥革命 227
- 二、宁波帮与抗日战争 235
- 三、宁波帮与当代中国 247

第七章 探源篇

- 一、传统家族同乡关系与宁波帮的崛起 259
- 二、买办与近代宁波帮 271
- 三、宁波帮精神漫谈 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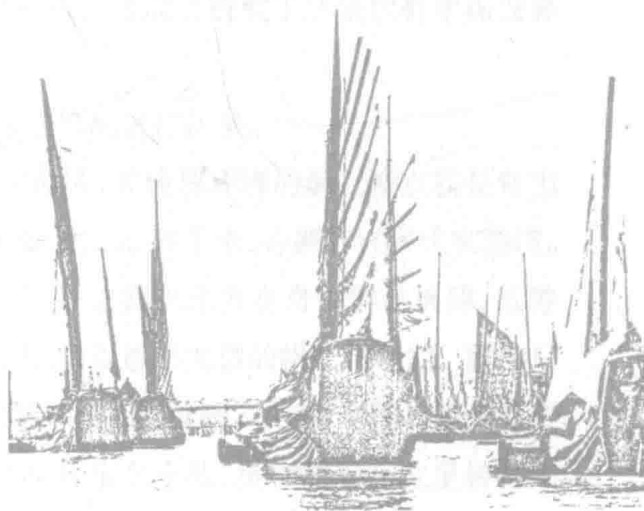
第八章 桑梓篇

- 一、宁波帮与宁波的近代化 295
- 二、宁波帮与当代宁波 313

- 后记 319

第一章 形成篇

地处中国大陆海岸线中部的宁波，海上交通便捷，唐宋以后即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由此形成声名远播的明州海商。而进入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王朝海禁政策的影响，宁波商人在海商势力遭受重挫的情况下，转向内地发展，尤其是在京畿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获得长足的发展，并开始以商帮的形式出现在各地商业活动中。



一、宁波帮形成的地域因素

宁波帮其实是宁波商帮的另一称呼。对于商帮的定义,学术界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但一般看法认为,这是一个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宗族和地缘乡谊为纽带,在客居地建立同乡(或同乡兼同业)会馆、公所,自发形成的既紧密而又松散的商人群体。而宁波帮则是明清以来宁波府旧属鄞县、奉化、慈溪、镇海、象山、定海、南田及现行政区划中的余姚市、宁海县在各地活动的工商业者,以地缘、血缘关系为基础结成的地域性商人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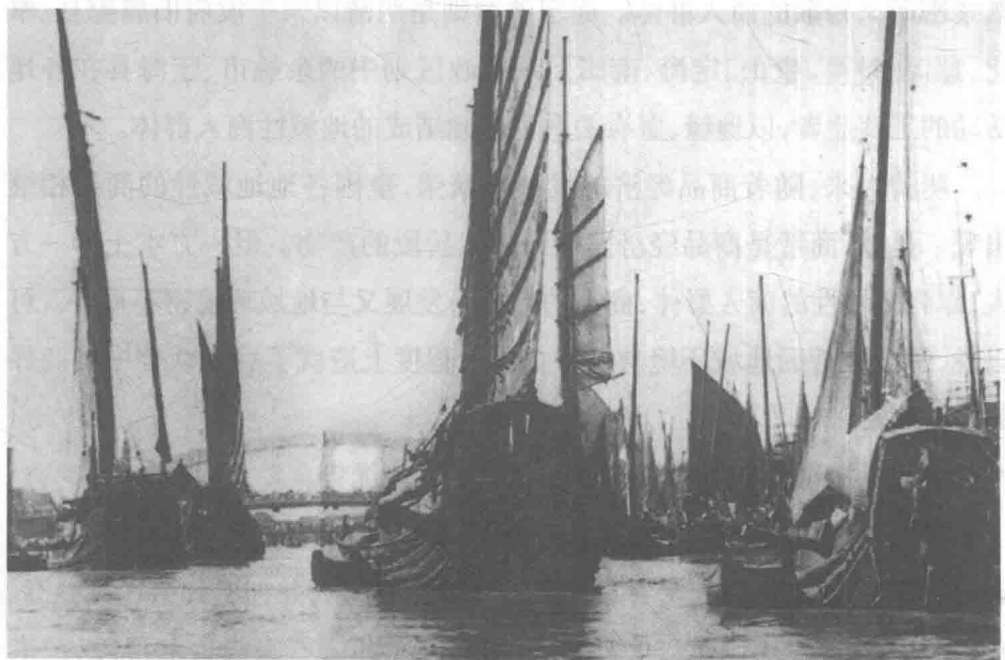
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全国各地地域性的商帮相继出现。显然,商帮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商帮的产生与发展又与地域环境密不可分。可以说,宁波独特的地域环境与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后来饮誉中国商界的宁波商帮。

宁波人从事商业活动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宁波地处中国东部沿海的浙东地区,其地理环境的最大特点就是背山面海。濒临东海的宁波,海岸线漫长,达 800 多千米,并拥有许多优良港湾。特别是宁波港,长年不冻,水道宽广,加之其东北方有舟山群岛屏障,故港内风平浪静,是理想的船舶停泊码头,可以进出大型的帆船与轮船。就港口条件而言,宁波港在全国沿海各大港口中相当优越。史称“宁波比福州更便于大型船出入,山东来的帆船主要都聚集在宁波,货物需要在这里转移到

较小的宁波船上再转运到南方沿海”^[1]。由于“宁郡六县,俱皆滨海”,“西南自岭粤,东北达辽左,延袤一万四千余里,商船番舶,乘潮出没”,“内则联络众省,外则控制东倭”。这些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宁波“有鱼盐市舶之利,实东南之要会也”^[2]。

宁波地理环境的另一特点是人多地少,土地资源贫乏,发展农业经济的条件先天不足。早在南宋时期,宁波一地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就开始显露出来。进入明清时期,这种人地矛盾更加尖锐。史称“四明襟山带海,地狭民稠,乡人耕读外,多出而营什一之利”^[3]。宁波不仅可耕地缺乏,而且这里的土质大多不适宜水稻等粮食作物的种植,以致宁波一地很早就有“宁波熟,一餐粥”的谚语。长期以来,粮食问题都是困扰宁波社会的一个大问题,迫使人们寻求农业以外的出路,外出经商谋生成为许多宁波人的必然选择。



20世纪30年代帆船林立的宁波三江口

[1] 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5页。

[2] 转引自王遂今主编:《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3] 上海图书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9页。

历代宁波人口统计表

时间	人口		资料来源
	户	口	
康熙四十年(1701)	103256	214710	雍正《宁波府志》卷一二,《户口》
雍正九年(1731)		409688(丁)	雍正《浙江通志》卷七二,《户口》2
乾隆五十一年(1786)		1936000	《中国人口史》第5卷,第170页
嘉庆二十五年(1820)	561809	2356157	《嘉庆重修一统志》
民国八年(1919)		2712304	《宁波市志》卷4,《人口》
民国二十三年(1934)	681924	2827149	《宁波市志》卷4,《人口》
民国三十七年(1948)	595735	2519961	《宁波市志》卷4,《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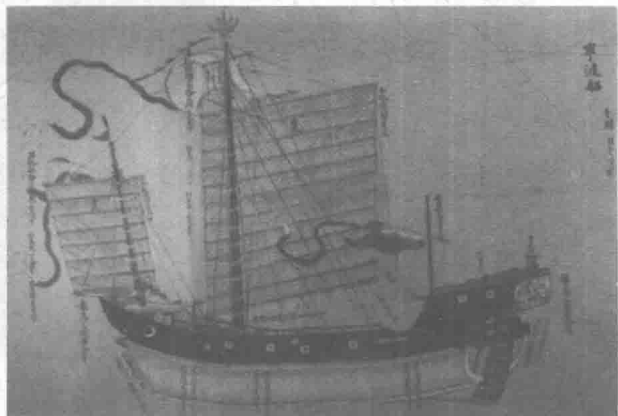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乐承耀:《近代宁波商人与社会经济》,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同时,明清时期浙东一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宁波商帮的孕育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社会环境。许多宁波商人正是在家乡得到商业活动的熏染,而后大步走向外部世界的。进入明代中期以后,宁波一地商品经济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农业与手工业的进一步分离,农业与手工业内部出现专业分工,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而且表现在区域内市镇集市快速发展,出现了许多专业性的市场,商品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交通的便捷还使当时宁波一地成为南北货物转运中心与集散地,城乡商业网络进一步健全,特别是为各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的钱庄业已有一定规模。这种经济环境使宁波一地较早就形成一种崇商、尚实的社会氛围。人们重实际,尚功利,商品意识比较活跃,受崇本抑末思想禁锢较少。“古道遗风,鲜有存者。”^[1]

[1]明天启《慈溪县志》卷一《风俗》。

二、明州海商

在宁波帮作为一个商帮形成以前,宁波(明州)海商早已存在,并且比较活跃。宁波秦时称鄞,早在秦代以前已有近海岛屿上的鱼贩盐商和滨海地区的商贩来这里集货贸易。据《乾道四明图经》载:“鄞山……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而后,汉以县居鄞山之阴,加邑为鄞。”唐宋时期,宁波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志书称当时的宁波(明州)“唐宋市舶,遥达海外”^[1]。唐时泛海兴贩的中国商人,“南路照例从明州出发(即使是从福州或台州开出的船,一般也先到明州停泊),横渡东中国海,到达值嘉岛,从此再进入(日本)博多津”^[2]。从中涌现出李邻德、李延孝等明州海商。宋代开赴日本、高丽的商船也大多在明州放洋。北宋宝元元年(1038),去高丽经商的明州商人,有名可考的就有陈亮等 147 人。南宋张津在《乾道四明图经》中称当时的明州



航行中的宁波船

[1] 民国《鄞县通志》,序。

[2]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0—123页。

“虽非都会，乃海道辐辏之区，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1]。元代，庆元（即今宁波）江夏码头改称下番滩码头，“番货海错，俱聚于此。”时称定海的镇海也系“蛮夷诸番舟帆所通，为一据会总隘之地”^[2]。

进入明清以后，封建王朝厉行海禁，宁波商人的合法贸易渠道被堵塞，而走私贸易异常活跃。明嘉靖年间，宁波通番者已“不可数计”，甚至“极远之物，皆能通之”^[3]。日本人中村新太郎说：“明代日本对华贸易“在特许权之外，商人们私下贸易也很盛行，主要的途径是在宁波通过明朝人作为捐客来进行交易”^[4]。嘉靖二十一年（1542）后，由于包括双屿港（今舟山六横岛附近）在内的浙江沿海走私贸易港口相继被明军攻克捣毁，明州海商势力遭受重大挫折。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海禁解除后，宁波自明嘉靖以来沉寂百余年的沿海和海外贸易活动又迅速活跃起来。时人称“民情踊跃争奋，自近洋诸岛以及日本诸道，无所不至”^[5]。

当时许多宁波商人活跃在这条南起闽粤、北达辽东的沿海商路上。如雍正、乾隆时有鄞县商人孙弘孝“尝挟策游吴门，贸海岛……死于文莱国中”^[6]。同一时期的四明章溪孙绪铨（1693—1766）也是“贸易远方，东粤南闽间，常以万金相往返”。海商谢占壬则活跃于北洋航线上。他自述“自幼航海经营，从闽省以至奉天，常年往返”^[7]。当时北洋航线日趋繁忙，“数十年前，江浙海船赴奉天贸易，岁止两次，近年则一年运行四回。凡北方所产粮、豆、

[1]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卷一《分野》。

[2]元至正《四明续志》卷三。

[3]万麦：《玩鹿亭手稿》卷三四。

[4]中村新太郎：《中日两千年》，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1页。

[5]姜宸英：《湛园集》卷四《论日本贡市人寇始末》。

[6]《四明章溪孙氏宗谱》卷七《戴忠及胡氏蒋氏合传》。

[7]《四明章溪孙氏宗谱》卷七《塞庵孙公传》。

枣、梨,运来江浙,每年不下一千万担”^[1]。可见规模之大。为此,嘉庆二十四年,在关外、山东等处贸易之宁波商人在上海集资创建“浙宁公所”。乾嘉以后还有横跨南北洋航线从事长距离贸易的鄞县商人,如陈沅(约1780—1850),“以家贫贸迁,南走闽粤,北达燕赵”^[2]。

宁波是清代对日贸易的主要口岸,宁波海商在从事对日铜料贸易中显赫一时。清代铸钱需要大量铜料,康熙帝平定台湾后,日本铜料开始大量输往中国。1772年,清廷责成江浙两省专管办铜事宜。日本正德五年(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颁布限制唐船入口贸易的正德新令,以信牌作为船主合法贸易的凭证,其中正德五、六两年共发放信牌43枚。江浙籍铜商取代闽商在对日铜料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乾隆年间经营对日铜料贸易的鄞县商人王世荣更是显赫一时。王原为长芦盐商,曾捐职郎中,每年将引盐30万包,经天津贩往直隶大名府销售。乾隆四十年(1775),负责输入日本铜料的官铜商范氏破产后,王氏即取而代之,并成为在历任官铜商中办理时间最长的一位。继王氏之后为官铜商的是其姻亲钱鸣萃。在1756—1780年日本配铜征文中出现南京船23姓、宁波船16姓。其中16姓分别是赵、谢、邱、黄、钱、郑、周、郭、王、尹、沈、林、何、杨、伊等。据学者魏能涛研究,当时洋铜商当时获利极为丰厚。^[3]

[1]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八《古今海运异同》。

[2]光绪《鄞县志》卷四三。

[3]魏能涛:《明清时期中日长崎商船贸易》,《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

三、宁波商帮的形成

明代以前,与时兴时衰的沿海和海外贸易活动相比,宁波商人在内地的商业活动相对滞后,且在声势上远不及前者。尽管如此,宁波商人在内地的商业活动几乎与海商活动同步进行,至少在北宋时期,已有宁波商人在内地活动的记载。如宋代鄞县人张云衢“起家货殖,结约徽商,同客淮扬,遂以资雄一乡,称封君焉”^[1]。元代的倪宓则是一个能左右米市的巨商。志书称:“倪宓使人贾泉州,得米盈巨舰,米商随而至者六十余艘,价腾踊,宓故损其价,群商恨之”。^[2]

进入明代以后,受各地商品经济发展和封建王朝海禁政策的双重影响,宁波人外出经商者不仅在数量上剧增,而且其商业活动重心也由沿海与海外贸易转向内地,并在明末清初出现地域性的同业组织——鄞县会馆、浙慈会馆,从而标志着宁波商帮的初步形成。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阶段,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吸引了历经明王朝海禁政策打击的宁波商人。人口众多,消费能量巨大的京畿地区也吸引了不少宁波商人。据载,鄞县光溪桂林徐氏家族的徐昂“年逾壮时,

[1][2]转引自王遂今主编:《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第3页。

始挟资游姑苏、南郡间，量度出入，意表几若端木氏之臆中焉，往返十余年，俯拾咸给”^[1]；徐佩“弃儒业，服贾于苏州”；徐桂“为姑苏大贾”^[2]，均在苏州经商致富。此外鄞县迎恩桥李氏家庭的李邦绘“服贾四方”，李邦综“服贾市廛”，李贤升“少承父业，从事贾业”^[3]。还有扬名苏州的百年老店“孙春阳南货铺”创办人孙春阳，“明万历中，年甫弱冠，应童子试不售，遂弃举子业，为贸迁之术，始来吴门”^[4]。到乾隆时已闻名苏州。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称“苏州皋桥西偏，有孙春阳南货铺，天下闻名，铺中之物，亦贡上用……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十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吴中五方杂处，为东南一大都会，群货聚集，何啻数十万家，惟孙春阳为前明旧业。其店规之严，选料之精，合郡无有也”^[5]。

此后，随着外出经商宁波人的相对集中，各种宁波同乡组织开始出现，如明末清初在北京设立的鄞县会馆、浙慈会馆就是史料记载最早出现的宁波同乡组织。据立于北京右安门内郭家井二号四明会馆《四明会馆碑记》称，鄞县会馆“相传为明末吾郡同乡之操药材业者集资建造，以为死亡停柩及春秋祭祀之所”。“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浙慈会馆则在清初成立，史载当时北京成衣行“皆系浙江慈溪县人氏，来京贸易，教道各省徒弟，故名曰浙慈馆，专归成衣行祀神会馆”^[6]。

进入清代以后，宁波商人更加活跃，如康熙八年（1668），慈溪慈水镇乐梧冈在北京开设同仁堂药铺，不久即誉满京城。乾隆年间，宁波商人在北京设立的“四大恒”银号，“信用最著，流通亦广”，是京师“著名钱铺”。乾隆十六年（1751）在京的鄞县商人发起重建鄞县会馆时，捐资的宁波商人达

[1]《四明光溪桂林徐氏宗谱》卷五《智庵府君传》。

[2]《四明光溪桂林徐氏宗谱》卷五《句余子传》。

[3]《迎恩桥李氏宗谱》卷一四《世传》。

[4]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四《杂记》。

[5]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四《杂记》。

[6]转引自王遂今主编：《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第4—5页。

680人之多。^[1]当时在京经商的鄞县商人有的已颇具实力,如嘉庆年间的朱国光(1756—1827),号藕庄,经商“居京师四十余年,吾乡(宁波)之来贸鬻于京者,急则通其财,疑则询其谋,难则解,纷则释”,他自述“余少壮时,昧宵昏而犯霜露……凡以糊口计。今纵不能拥高资,而视中人产有过者,于愿大足”;其子朱士钧(1777—1831),号子庄,“侍其尊甫藕庄先生,贸易京师”。^[2]在这一时期,宁波商人不仅在北京、天津、营口等北方商埠势力有所加强,并在南方商业重镇常熟、汉口、上海等地建立会馆,结帮经商:乾隆三十年(1765),宁波商人联合绍兴商人在江苏常熟创立宁绍会馆。乾隆四十五年(1780),宁波商人在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汉口设立浙宁公所。

嘉庆二年(1797),在上海谋生经商的宁波人集资创办四明公所。

嘉庆二十四年(1819),在关外、山东等地经商的宁波商人相约在上海设立浙宁公所。

明清时期,宁波商人从事的行业主要有民信业、药材业、成衣业、南货业及沙船业。尽管其势力与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徽商、晋商难以抗衡,但宁波商人的足迹已遍及半个中国,在各地商业贸易活动中异军突起。

从上可见,到了鸦片战争前夕,经过长时期的积累,后来居上的宁波商帮在各地商界已不是一支无足轻重的力量,相反,经过清代的发展,宁波帮的势力迅速扩张,其活动范围与地域也不断增加。正如学者张守广先生所言,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从发展态势以及整体实力、规模上,宁波帮超过了曾在中国商业领域盛极一时的徽商,成为江南和我国沿海一带既颇具实力,又生气勃勃,既扎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又与外部世界保持着贸易关系的沿海著名商帮。^[3]

[1]董秉纯:《春雨楼初稿》卷十《创建鄞县会馆碑记》。

[2]《四明藕桥朱氏宗谱》卷三《藕庄及周孺人七十寿记》,《小庄先生五十赠言》。

[3]张守广:《超越传统——宁波帮的近代化历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